

遮蔽的文明

陈绶祥 / 著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京)新登字210号

责任编辑: 吴鹏 田苗

版式设计: 田苗

遮蔽的文明

陈绶祥 著

出版: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发行: 新华书店

照排: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

印刷: 北京百花印刷厂

850×1168 大1/32 印张: 15、25 插页: 4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26-089-3/G·33 定价: 15元

出版前言

《遮蔽的文明》一书收入了作者的专题研究文章三十篇，对中华文化的人性特征，对与龙有关的文化现象，对面具与农业文明，对彩陶艺术、玩具艺术、建筑艺术、美术史等中华文化与艺术中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具有独特见解的剖析和阐述。

作者陈绶祥先生是位博闻强记、见地不凡的中年学者。著名学者王朝闻先生曾评价他“有审美敏感，有比同龄人较丰富的知识，对学术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从本书的目录也可以看出作者治学的领域是十分广阔的。其文章具有“精于学、邃于文、熟于事”的特点。作者性格宁静、淡泊，在研究中常以“无迹方知流光逝，有梦不觉人生寒”自励。作者在做学问或写文章中，持“大道如常、小技雕饰”的态度，用轻灵、平易的笔法，浅出深入地阐述他的艺术心得与见解。这在理论文章中可算是别具一格。此外，从行文中还可以感受到作者独具特色的幽默感，以及洞察问题的敏锐机锋。

由于篇幅所限，本书只展示了作者研究成果的一部分，但仍在总体上体现了作者的学术风格与水平。我们将本书献给喜爱、关心中华文化与中华艺术方面的课题的读者，献给希望了解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及关心当代文化发展与建设的读者。

后记

有梦不觉人生寒

十三年前的初春，我只身来到举目无亲的京华，就学于蔡若虹、王朝闻先生门下，寄寓在后海前沿恭王府内一个集体宿舍中。

那是一个冻雨敲窗的春夜，陆君要离京赴美求学，他特地邀我到崇文门当时北京唯一的粤菜馆共进晚餐。陆君是岭南人，他只有用粤菜来寄托一下他那去国怀乡的难舍柔情。我们喝了点儿酒，微醺中回到了恭王府内小角落中他借用的那狭小的琴房里。昏黄而温馨的灯光下，他为我弹奏了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一开始那遥远而沉厚的和弦就敲打着我的心，那悠长而平缓地起伏着的主题，使我胸中逸气越积越厚又总是绕而不发。我实在不堪这当时看来也许是死别的生离，霎那间涌出的泪水使身心突然变成了一片解脱的空白。琴声融成了一片亘古的轰鸣，四周闪现出一片耀眼的新绿，仿佛是大地母亲对孩子的祝福。我突然记起了多年以前离家求学时家母赠我的诗句：风景宜人随处好，何须定向故园看。渐渐地，拉赫玛尼诺夫那清越而绮丽的旋律又在耳畔响起，那正是他在大洋彼岸怀念俄罗斯故土的倾诉，是纪念那开满薄公英大地时的吟哦。我知道，陆君正借着这音符的图画向我描绘他的幽思。一曲终了，我们无言相对而都把脸转向窗外，接着，又默默地步入那料峭的春寒中，但春雨毕竟洒在了我们的脸上，溶化了满面的泪痕。

恭王府的大门旁，街灯让细雨的迷蒙包围着，银上了一圈圈

五彩的光环，春风刮起的雨丝游曳着，像是在夜空中飘荡的一个个灵魂。

“你真的不打算走吗？”陆君喃喃地问我，那声音仿佛从另一个世界中飘进我的耳朵。

“你是应该走的。”我答非所问地说。我不知道如何安慰这个在文革中失去几乎所有亲人的朋友，他已经无家可归了。“乱时相依倚，清平各自飞”，浩劫之后各人重整自己破碎的心灵时，他越发孤寂起来。我以为换一个大环境对于他那寂寞的心来说，总归会是一种解脱。

但陆君却拉着我的手喃喃地说：“可是，我害怕那陌生的气息，我永远会想家啊！”

我知道他想的家是什么，因为我们曾共同沉浸在“月是故乡明”的赞叹与“乡音无改鬓毛衰”的遐想里，何况我们早已过了“而立”之年，又带着一颗天生敏感且不善忘却的心。于是，我只好仍是喃喃地说起“大丈夫志在四方”、“你选的专业必须到外国进修”以及“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处黄土不埋人”之类的废话来。

我送他走到车站，他又送我走回来，不知过了多久，也许要错过末班公共汽车了，而那时的北京，几乎找不到出租汽车。终于，陆君默默地站定，深深吸了一口气。明天的此时，他也许就站在异国的土地上了。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还是‘道远无复论，努力加餐饭’吧！”我终于说出了我极不愿说的又一句废话。让离人吃饭，那从汉代古诗到现代口头问候中都忘却不了的中国真理。

陆君却郑重地点点头，然后又郑重地问我：“你真不打算走么？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打算？！”我突然想起来我是否该有点什么“打算”了。其实，

我真不知道什么打算。在我看来，打算本也和希望差不多。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所谓无的，然而，打算就有么？如果希望如同地上的路，那么，打算也许只能是路上所行的车。霎那间我又想起了许许多多的往事来：10岁那年，我上初中，就打算着要当一个演员，可后来，“家庭出身”不好的我只能辗转着做一个当演员的梦；上了大学，我又打算着当一个科学家，然而几年之后，曾被人挂过“反动学生”牌子的我还是只能当一名被暗地监督劳动的铁路养路工，并且已经做不成当科学家的梦了。但我似乎仍不肯放弃什么打算，我仍在作梦。记得有一次，我又作了一个梦，梦见我在高高的天空中穿云破雾地飞行，突然，那陌生的神瞪着眼问我上天来有点什么“打算”，我始终答不出有什么打算而惊醒过来。那正是1976年一个黎明前似乎黑暗无边的春晨。于是，我只能在“梦坠空云齿发寒”中吟成了《记梦》的几句：

“云海雾山识不得，金弦银箭振车辙，
日车霏霏羲和走，仙娥谁识昭阳客。
寒深天梯隐湿露，茫茫元气之何处，
欲张云帆九万里，帝口未开风无主。
鸿龙玉狗眼犹白，霹雳电光闪愁色，
青娥素女渺无迹，琼楼玉宇皆淡泊。
忽听人歌行路难，何向天宫解束勒，
侧身咨嗟归沅湘，荒鸡三唱天未白。”

如今，当远行的友人问起我的“打算”来，我该说些什么好。

陆君急切地望着我，他的眼睛仿佛是夜空中的萤火虫。我避开了他的目光，轻轻揭开了自己最沉重的心扉之底门。

“打算做梦”我仿佛对自己说，“做一个中国的梦。”

我知道自己，永远只能是一个做着五彩梦的孩子，我深信梦中的一切。

“是的，我又何尝不是在企求着做一个新的梦呢。”陆君默许了我的回答。我知道，他会理解我的期待与祝福。我曾经暗自写过“人生如梦，梦似人生，人生常假梦常真”的词句，我并不承认梦的破灭，因为我要肯定生命追求的价值。

在陆君登上末班公共汽车向我挥手时，我们会心地笑了。我在春雨中又吟出了“无迹方知流光逝，有梦不觉人生寒”的句子来。

十三年如同流水般地逝去，神州大地上十三年的变化，正是我作梦也未曾想见的。十三年来，在京华“半为隐士半劳碌”的我，也许是还算自在地做着我“打算”的那个梦。七月的一天，在上海旅次中的我忽然发现了报纸上陆君归国举行演奏会的消息与评论，那赫然在目的曲目中，仍有那首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欣喜之余我不自觉地拿起了电话，然而，我追不上行色匆匆的朋友。当我回到北京后，陆君又离京远行了。“人生不复见，动如参与商”，难道缘份真该如此，我不但没能见到陆君，甚至还错过了他演奏会的转播。也许这倒好，我反而永远忘不了那间狭小琴房中冻雨敲窗下的春夜。

在莫名的惆怅中，我感到岁月并不原谅我的记忆，我似乎觉得也应该将自己借以温暖人生的梦，留下一些不负流光的痕迹来。于是，便从那些故纸堆中，搜寻出这本集子的文字。是流连，是回顾、是总结，还是期望，我说不清，也许只是诉说给友人的荒唐的梦呓。

我本打算给它取个《无痕有梦集》之类的名实相符的书名，但近年来时髦的“文明”（也是文名）大多已脱光了屁股。不但使得中国的“礼仪”丧失殆尽，就连中国那种“衣冠禽兽”之类的骂人话也“无从附体”，更有甚者，连真善美中的“美感”也认为只能从“动物的快感”那儿去“有根有据”地获得。我便只有让自己的

“文”有意地遮蔽一下罢，因为我们还希望作一个中国人主张的那种“知足也应知羞”的人类。

也许那遮蔽着的中华文明，将是我永世追求的真梦。

1991 年岁末于桂林一梦庐

目 录

出版前言

中华文化的人性特征.....	1
中华文化的开放性特征	19
一“指”禅随笔:指“一”.....	31
一“指”禅随笔:道“二”.....	35
中国绘画的物我观念	38
遮蔽的文明	43
中国龙	54
一 龙迹.....	56
二 龙神.....	67
三 龙情.....	84
四 龙韵.....	95
彩陶艺术研究.....	104
一 农神文化	104
二 象形纹饰	129
三 几何纹饰	159
四 文明的曙光	187
面具与农业文明.....	199

玩具的文化性散论·····	215
民间美术三论·····	224
祥云·卷草·如意·····	231
引子:“纹饰”也是“文实”·····	231
一 恒河沙数与中华风物·····	234
二 找到了症结·····	236
三 文化的贡献·····	241
小结:顶礼 中国菩萨·····	246
中华建筑艺术与中华文化论纲·····	248
一 心性与构筑·····	249
二 观念与造型·····	254
三 文采与装饰·····	260
近大远小·以大观小·变时化空·····	263
写死·写真·写生·····	270
素描的“素描”·····	280
朝闻先生美术史观之我见·····	298
一 史论之争·····	299
二 审美历史·····	304
三 了解对象·····	309
四 创造自己·····	314
新文人画论·····	319
一 劫后大悟·····	320
二 地造天设·····	330
三 选文择画·····	336
今存顾恺之画论的辩名·····	350
现存魏晋南北朝画论考订·····	361

“六法”辨析·····	377
一 现在“六法”的回顾 ·····	377
二 关于“六法”的质疑 ·····	379
三 谢赫“六法”之辨析 ·····	383
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神论”发展的几个阶段·····	392
一 顾恺之阶段 ·····	394
二 山水画形成初期阶段 ·····	409
三 “六法”阶段 ·····	419
魏晋南北朝美术史导论·····	434
一 艺术与人生 ·····	435
二 理论与玄风 ·····	440
三 文化与宗教 ·····	444
折腾本己·····	449
自强不息·····	454
不要忽视创新的传统·····	457
石鲁传代画序·····	464
朱屺瞻画序·····	467
《中华艺术丛书》跋·····	470
《三文丛书》序·····	472
后记 有梦不觉人生寒	

中华文化的人性特征

——《吾文吾理》之一：《人性篇》

【原序】

主编盛情，再三约我撰文谈谈中华文化。

我性情闲散，好“述”而不“作”，爱得“意”忘“行”，其实，都是难以提笔的托辞。况且本人又有“身在此山中”之癖而没能飘洋过海去“蓦然回首”一下来看看“老土”（只是故土的含义、以应时髦的心理需要），也没能到月亮上去“向前看”地望望“蓝色”的“地亮”（只是月亮的类比，以应时髦的“文化之光”），更缺乏那种可杀不可辱的“士气”，怕作了那叫做“鹬”的形象而被当作箭靶。后来，作了一个梦，终于在梦中上了天，入了地，也见了周公，也当了南柯太守。可见于名利仍未忘却，醒来便洒脱了许多。想想，反正早已活过了甘罗、王弼、王勃、李贺他们的寿数，还是“写了吧！”于是理了个总题目便信口开河，学着柴可夫斯基写《四季》那样应景作起“曲”来（只有不平不直的扭斜之含义），十二个月总得有一打篇目，于是搜肠刮肚，得曰：①人性、②开放、③变革、④志记、⑤哲理、⑥教化、⑦神灵、⑧纲纪、⑨权术、⑩性情、⑪艺文、⑫风俗。姑妄依次而言，并学林语堂先生那本“吾民吾土”的样儿，起了个总题目叫“吾文吾理”。仿佛郑板桥在唱“道情”（是真正的道“情”）。我的观点也许同很多人相悖，自视价值也正在于此。但我可不想抛“玉”引“砖”，也不想与谁“商榷”。

欧洲的圣哲们在将全部精力放在争论“一个针尖上能容纳多少个天使”的时候(奇怪! 至今我国还有不少新兴的“当代学者”认为这是非常高超且必要的“理性思维”问题), 人便只能是上帝手中的“东西”或者“其它东西”上的“肋骨”了。整个西方十四世纪之前的“经院哲学”以及所统领的一切文艺、科学全是神的殿堂, 那儿虽然每一个针尖上都布满了许多天使, 但却没有一丁点儿人的立锥之地, 那时, 整个西方文明对人的认识可说是等于零。十四到十六世纪, 西方先进的哲人们怀疑起神殿的构架来。于是, 他们一如许多革命者一样, 从古希腊、罗马的文明中找到了似乎是描绘人, 其实是描绘神的“文艺”大纛, 以“复兴古希腊文艺”的“复古面貌”, 行摧毁“经院神学”的“创新行动”。于是, 许多朴素的上古学问被发掘, 被理解, 被运用, 被阐述。于是, 便如“王弼注易老”那样在欧洲大地上发生了一场“六经注我”的运动来, 我们便得以窥见了那个伟大的“人性”和“人道”的出现。最初, 还只能“犹抱琵琶半遮面”, 哲人们、匠师们接二连三地解释: “人是上帝创造的最佳范模”, “人体便是上帝的模样”。但是, 一方面哥伦布和麦哲伦受到举国上下的欢迎, 另一方面, 伽利略和布鲁诺却要被审判和被烧死; 一方面, 培根升任大法官, 另一方面, 伏尔泰却被放逐。欧洲十八世纪的先知先觉, 也只能在自然的认识上提出了实为“人的社会品质”的“平等、自由、博爱”作为人性口号, 但他们对人的自身还是一无所获。而西方传统的“物化哲学”却在这种复兴中大展其能, 那种“有一个支点便能撬起整个地球”的假说使得哲人们喊出了看似科学, 实则荒谬的“人是机器”的口号, 对神学的批判让给了对物的崇拜。随着钟表、玻璃镜子、万花筒和放大镜在西方文明中的泛滥, 那建立在数理基础上的哲学只有“将人作物”似地把人体宰来割去, 支、离、剖、度地研究起来, 但“物”之“理”终于没能解说出“人”之“心”。于是,

经典力学之父牛顿又回到了“神力”的万能中。新生的青年们在看腻了机械次序之后便逃逸到自然里面，高更不是在呼喊“你们留恋那个社会干什么，你们留恋那个将人当作机器的社会干什么”的同时，抛弃了万贯家财而只身逃到塔希堤岛去了么！仅管如此，“物”化之繁荣毕竟创造了一个五彩缤纷的身外世界，人们转了许多圈，认识了“人是工具”，“人是奴隶”，“人是最精美的机械”，“人是高等动物”，“人是由猿变来的生物”等等许许多多的道理，但是，它们又如隔靴搔痒似地更激起了人们对“人”那个“自身本质”的兴趣。马克思总结了一个时代的认识和发现，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似乎摸到了些什么，但又似乎还是没有摸到。定型化产品的流通价值，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伊甸园，经院哲学的逻辑思辩，构架了一个牢固的理论三角形，然而，就其本质上也正如马克思所言，它们只在“就其现实性”上框架了人生。于是，西方许多有识之士又在故去的圣哲那儿找出了新的发展来：生物学家与细菌学家研究每一个细胞的经验，难道不可供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借鉴来做一个个大小社会的考察；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研究每一件物体以至分子、原子的运动，难道不可供生态学家和病理学家借鉴来作一项项事例的剖析；数学家的思维可使世界建立在“逻辑原子”身上，革命家的经验可作为世界结构的“实用哲学”。于是，西方文明花园中也出现了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孟德尔与佛洛依德，摩尔根与佛洛姆，科学家也好，神父也好，在做又一次“致广大，尽精微”的对人的探索，但不无遗憾的是，在他们认知、判析、推演、总结的整个过程中，“人”仍然是一个分离着而按一定构成方式联络起来的“物质”，或者是一类联系着而按一定顺序变化方式分开来的“分子”，或者是某些自然法规和社会关系造就与限定的“东西”，说到底，人还是物，

只不过是自然产物与社会生物。然而可喜的是,对人自身的剖析在新的世界中带来了新的希望,对自身的深入理解否认了原来的自身。文艺家与西方现代哲人们一道冲击了以往西方文明中对人的一切认识,他们从人的情感与人的思想所创获的信息符号中去解读人的自身。毕加索愤愤地问道:“你们为什么老要问我的画是什么意思,而不去问鸟儿们唱歌是什么意思。”马蒂斯不无幽默地对那些指斥他画的妇女太丑的贵妇们说:“我是个画家,画家不创造女人,只创造图画。”马格利特在他那巨大的悬在空中的烟斗画幅上反复书写“这不是烟斗”来作为他的座右铭。艺术家们并不孤立,超现实主义运动一开始便有文学与哲学的介入,表现主义与前卫主义、波普艺术也绝不是文艺单独的事情,克罗齐与席勒、罗素与怀特海、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等许多哲人们虽然依旧用数字、用逻辑、用现“象”、用符号来诠释、理解、判断人生,但这些对象本身并不再是度物所定的结果,而已变成人思所得的“文”“志”,不再是物运所规的“定则”,而已变成了人历所获的格“律”了。于是,在又一次“个性”、“自我”的解脱中,实质上已不再讨论那种与“人性”无关的“个体”“典型”等问题,而直指“人”“生”的精义。萨特等许多西方哲人们终于画出了:“我们是什么?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的巨大问号,这才是关于“人”“性”的千古隐谜。只有至此,“人”才从自然中、从社会中、从自我中彻底被窥见而成为世界之基石。西方文明熏陶下的智者,在追求自身表现的过程中才明白了“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的至理,终于将人构置在自古以来西方文化认为的最稳定的三角形中最重要的底边上,“自然·社会·人”成了新兴的宇宙框架,成了新兴的学术对象,成了新兴的艺术题材,成了……总之,“人”成了沟通其它二者之桥,如同中国太极图中那“S”形的一“道”象征的“人”的含义那样,既分割了阴阳之数,又连系了

阴阳之道。当然,也正是由于东西方文化与认识的区别,它们才形成了:一个在极端上的限制的连接;另一个在整体中无处不在的运动着的联接。一个在只有横着向极端方向延伸的扩展,这种扩展使人与自然和社会的距离增大,而只有将人与自然、社会压缩到一个逻辑上的“点”时,它们才统一起来;另一个却在任何方向上随着自然社会的拓展而改变自身的量数与大小,却又不改变其形状与特征,无论自然、社会、人如何地放大缩小,它们统一的至理是一统的。这也许要涉足于许多基本哲学观念才能更深入地讨论下去,但无论如何,只有在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完善构架才开始形成。于是才明白了:整个宇宙是建立在人的认识基础上的自然与社会。“自然·社会·人”,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发现。但我们谁曾知道,就在西方文明认知这个“人的宇宙”构架之前多少个世纪,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已将这种构架以自己理解的文化形式,以中华固有的精辟方式书写成“文”,粘贴到了每一户农家的“香火台”上,当成了高于祖宗牌位的“民族正神”呢?

不是吗?有史籍可稽,至迟自宋代开始,中国百姓们就供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了。那时的百姓不懂“现代汉语”,也没学过《自然课本》与《社会学讲义》,但我们谁能否认,“天地”正是中国人心目中的“自然”;“君亲”即指政权与家庭,它就是在西方社会学的严密构架中也是无懈可击的“社会”之注脚;而那中国的做“人”的标准,便集中在“为人师表”的“师”身上,这不俨然就是“自然·社会·人”的具体说明吗?

有些人会抬出“又是古已有之”的不满来。其实:“古已有之”并非是什么坏事,文化既是人们对宇宙认识的理念记录,人们只要记录了这些认识,它便会成为文化留在人类历史之中,这是什么坏事呢?真正的坏事恐怕是“现在没有”吧!

中华文化的人性特征,当然是“古已有之”的,而且还“古”得

很呢！

半个多世纪前，被骂为“洋奴文人”“假洋鬼子”的林语堂先生在他今天已重印并风靡世界的《吾民吾土》与《生活的艺术》等著作中娓娓动人地谈到了中华民族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他从衣食住行、艺匠工巧、婚丧嫁娶、声色犬马、诗文歌舞等许多信手拈来的事例中，弘现了中华文化作用于人生的真谛，指出了中华文化是让人懂得生活艺术的这一主旨。

我当然不愿再重复这些常谈，时过境迁的事例可以屡举常鲜，层出不穷。但“为人”的目的确会有不同的见解和不同的认识，理念本身并不需借助事物来阐述，而事例总是反、正都有，也并不证明任何理性认识，这便是中华文化对“文”和“行”的基本态度。就是在“为人”这一词汇的本身，也反映出中华文化对人的普遍认识来。读成平声的“为人”，便是“做自己”，而读成去声的“为人”，便是“帮别人”，“做一个人就是要为了人”，至理名言！这样一个简单的词汇，它积淀了多少深刻、平凡又精练的对“人”的理解啊！

这不是附会，更不是牵强。从一脉相承的文化履迹中，我们不难明白中华文化这种为人的根本。远在文字尚未统一之前的春秋时代，孔老夫子就以其“仁爱”哲学鸣世，而“仁”的根本便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爱人”。他的后学孟轲承其衣钵，其宗旨全是“讲道德，说仁义”，自此后的儒家学派，无不推崇“民本”“民贵”“民重”的思想，汉代崇尚孔子学说，其中心也是将“人”的地位提到“自然”与“社会”的框架上去，“天人感应”也好，“纲常伦理”也好，其本质仍是在“自然·社会”的认识中寻找“人”的自身。学说，不是只靠倡导便能实行的，也不是个人意志所能随意毁灭的。秦始皇烧掉的书许多都流传下来，而秦始皇不烧的书，却是一本也见不到了。文化大革命的焚书也是如此。儒